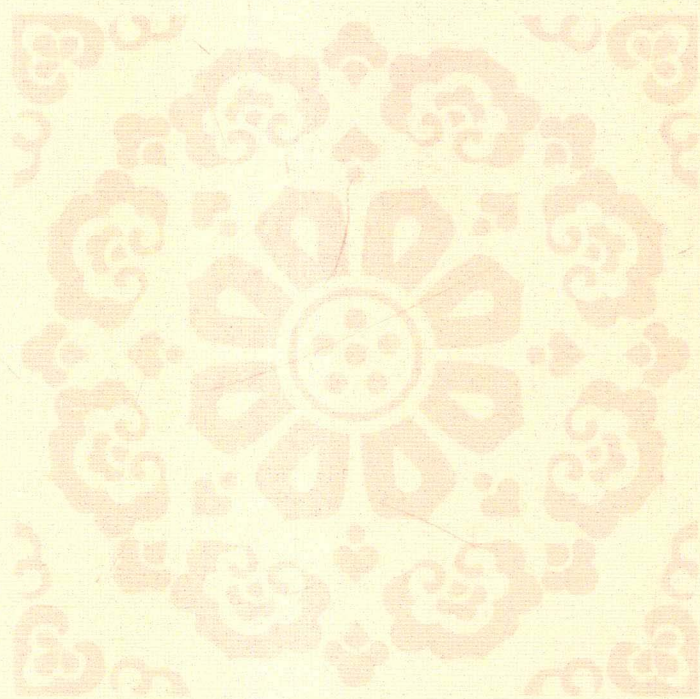


文廷式诗词研究

陆有富/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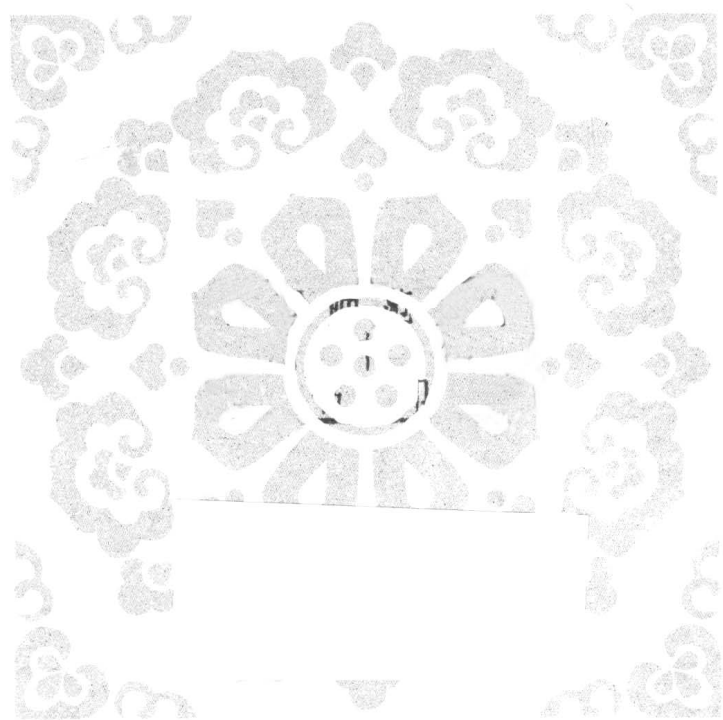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文廷式诗词研究

陆有富/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廷式诗词研究 / 陆有富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161-1197-0

I. ①文… II. ①陆… III. ①文廷式(1856—1904) - 诗词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057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明
责任校对 秦艳
责任印制 李建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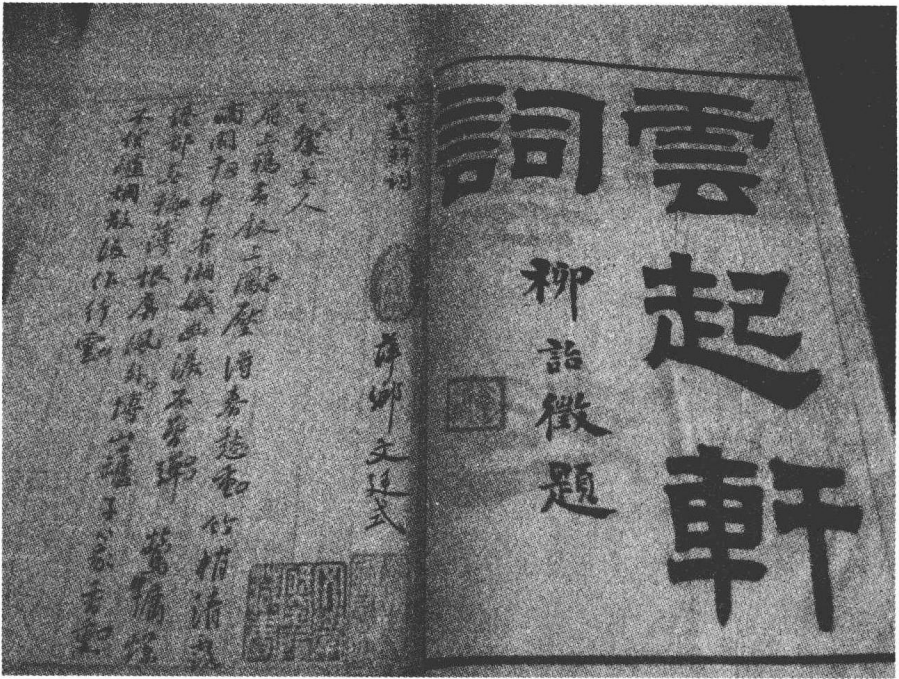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1.75
插页 2
字数 333 千字
定价 6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廷式像，杨鹏秋摹绘

(选自叶衍兰、叶公绰辑《清代学者像传》第二集)



文廷式《云起轩词》手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

石室秋方靜星河曉欲殘巖前接龍象木末結桂蘭浩
浩經千劫零二此一丸向來珍重意持與世人看

王昭君二首

莫道君王信畫師天昭騶從古攬抗旌旗單于親拜彤墀下
為問當年擬遣誰
絕代嬌饒甯寂沒可憐此意自英雄知君不是中行說
更有琵琶憶漢宮

萍鄉近亦產水仙花與閩產不殊惟花朵略稀耳

口占二首 癸卯正月

昔日河邊多解神凌波羅襪偶相親誰知萬壑千巖裏

序

王志民

陆有富君在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其导师是叶嘉莹先生。既有名师指导，本人又勤奋好学，广交师友，故而眼界开阔，学业精进。这便有了《文廷式诗词研究》这种较有分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陆君在读博的三年里，每逢假期，必回到呼和浩特来，回后也必到我家坐坐。因其在读硕阶段是我的学生，过从甚密；故假期见面，亦相谈甚欢。而交谈重点即其研究文廷式的构想及进展情况。这几年，他又发表了七八篇研究文氏的学术论文，我虽只看过其中一部分，但其研究思路，我大致是了解的。今其《文廷式诗词研究》即将付梓，我又认真读了几遍，还真有一些并非空话要说。

文氏是清末重要政治家、爱国志士、诗词大家和学者。长期以来，其诗名为其词名所掩，故其诗少有研究者；其词名又往往被王、郑、况、朱“清末四大词人”所笼罩，直到近些年来，才有较多的论著问世。实际上，这位“拔戟异军成特起”（朱孝臧《望江南》对文词之评价）之词作大家，本与“四大词人”并而为五，今之重新审视并加以重视，直是恢复其本来面目而已。文氏诗词兼胜，故陆君之研究也诗词并重。这样通过对文氏的全面研究，正可窥见动荡的晚清时局及当时的士人心态。就学术研究而言，也具救弊纠偏作用，故醒目攫人之处较多。这部《文廷式诗词研究》最可称道者，是文献搜罗之富与考辨之精审。凡研究古人著作，必兼顾其学术背景与其著述之全貌，方能作出全面、系统、公允的评价。陆君明乎此，故对文氏家世生平、交游结社，都作了精心考述，而对其著作更是认真加以考辨。又从文氏随笔、日记及清末民初诗词笔记中勾稽出文氏之词论、诗论数十则；补其遗诗 20 余首，残句若干，有目无诗者 80 余首；补遗其词 10 余首。还从近现代

词论著作中辑出文氏及其词作评论数十条，辑录了文氏诗词集之序跋若干篇。对文氏年谱及词作年代，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补入了新发现的资料，纠正了一些谬误，这些“复原”文氏全貌之作，皆需下大力气、大工夫的，也是前人和现代学者所没有做或尚未做完的功课，确实弥足珍贵。此外，对文氏之《云起轩词》的版本，也作了考述；对其词在后世之传播影响，又作了研究。此皆为别人所无而此著独有者。

关于文氏词风之研究，前人有不少论述，然多在其宗法苏辛上论辩。而陆君则从多个角度揭示其词之本质特征，并论述其风格之成因。认为文氏学步花间而深得花间神韵，承桃苏辛而又具自家个性；尤其具有词史精神，在晚清词坛独辟蹊径，独树一帜。论证中闪现着思想火花，洋溢着服人力量。

章学诚说过：“临文必敬”、“论古必恕”。“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文史通义·文德》）陆君此著，析理行文，几近“敬”、“恕”之道。在论述文氏诗与词时，指出其渊源与创新，也揭示其中之缺陷与不足，更分析其时代环境等因素之影响，即“能为古人而设身处地也”。不溢美，不掩瑕，其论中节，其语平善。深识之士，自能窥其灵府也。

七十九翁草于内蒙古师大莲东寓所

2012年1月15日

目 录

绪论	(1)
一 研究缘起、范围及意义	(2)
二 研究现状、思路及方法	(7)
第一章 文廷式的生平学术与交游结社	(13)
第一节 文廷式的家世与生平	(13)
一 文廷式的家世变迁	(14)
二 文廷式的生平行实	(17)
第二节 文廷式交游结社考述	(22)
一 文廷式交游考	(22)
二 文廷式结社考	(36)
第三节 文廷式著述考	(42)
一 存录文献考辨	(44)
二 俟考文献辨录	(51)
第二章 文廷式的诗学主张与词学观念	(56)
第一节 文廷式的诗学主张	(56)
一 清末诗学背景与宗宋诗学的影响	(57)
二 文廷式诗学主张探论	(68)
第二节 文廷式的词学观念	(80)
一 清末词坛的概况及词学演化的特点	(80)
二 文廷式词学观念探论	(98)
第三章 文廷式诗歌的精神内涵与艺术风貌	(117)
第一节 文廷式诗歌的精神内涵及审美特质	(118)
一 文诗的时代精神——从救世之志到衰世之音	(118)
二 文诗的艺术技巧	(124)

三 文诗的沉郁风格——以七律为例	(135)
第二节 文廷式诗歌的题材类型	(142)
一 忧时伤乱诗和悼挽诗	(143)
二 酬唱赠答诗和写景纪游诗	(153)
三 题画诗和咏物诗	(164)
四 官词	(175)
第四章 《云起轩词》的审美倾向与词史精神	(182)
第一节 《云起轩词》艺术渊源及审美意趣	(183)
一 《云起轩词》艺术渊源探析	(184)
二 《云起轩词》风格特征及审美意趣	(195)
第二节 《云起轩词》的词史精神	(227)
一 文廷式的“词史”意识	(228)
二 《云起轩词》对“词史”的实践	(231)
第五章 文廷式诗词的地位和影响	(253)
第一节 文廷式诗作在后代的接受和影响	(253)
一 文诗版本考述	(254)
二 文诗在晚清民国诗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257)
第二节 《云起轩词》在后代的接受和影响	(260)
一 《云起轩词》版本考述	(260)
二 从词选看《云起轩词》在后代的接受和影响	(266)
结语	(272)
附录	(274)
参考文献	(328)
后记	(336)

绪 论

文学是一个包括创作、传播、接受并产生影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涉及作品的写作、传播和批评，还包含作者的文学活动（交游经历）、作者创作观念的演变、当时社会的文学思潮、前代文学的滋养等内容。这些问题的研究讨论会为作家作品进入文学史并得到公允的评价提供丰富的资料。蒋寅先生曾在《〈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导论》中说：“中国文学的历史漫长而复杂，不同时代的文献资源为我们进入文学史过程提供了不同的条件，而明清时代的条件无疑是最优越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种优势，深入研究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为它提供一个忠实、细致而贴近历史语境的描述和诠释，这也许是文学史研究中最有价值、最有魅力的工作。”^①而恰恰相反的是，面对明清两代，正是因为我们占有难以廓清的浩瀚的典籍和大量的作品资源，才使得一部分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品被忽视，以致难以进入文学史的研究和书写，即使涉入，也不能给以正确公允的评判。因此，面对史料的特别恩赐，我们应该冷静地去观察各种复杂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件，辩证原因始末，清晰展示文学观念发展演变的轨迹，揭示文学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微妙联系，挖掘一直以来被遮蔽和忽视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本书便是在此启发下的一种尝试。书稿从个案研究出发，以文廷式诗词为研究对象，竭力理清清末与文廷式相关联的种种史料之间的因果关系，将文献考证、文学批评和文本评赏相结合，从不同角度把握作家作品，以期为文学史“进入过程”的书写提供一点可资参考的线索。

^① 蒋寅：《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导论》，《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一 研究缘起、范围及意义

我们在审视古代文学发展史并将目光聚焦在晚清的时候，都能深切地感受到当时世变背景下学术论争、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盛况。

康乾盛世之后，清王朝开始转衰。尤其是乾隆后期，政治黑暗，贪污成风，整个社会潜伏着重重危机。“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工、不农、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① 面对政治的专制和现实的情状，不少有识之士预感到社会终将要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他们内心之中又潜藏着一种无力回天的无奈感和郁积已久的压抑感。乾、嘉时期的包世臣曾在《再与杨季子书》中说：“世臣生乾隆中，比及成童，见百为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郁，殆将有变，思所以禁暴除乱，于是学兵家；又见民生日蹙，一被水旱，则道殣相望，思所以劝本厚生，于是学农家；又见齐民跬步即蹈非辜，奸民趋死如鹜而常得白金，思所以饬邪禁非，于是学法家……”包世臣意欲救世，但面对专制王朝的病人膏肓，却是无药可救，无法挽回，而包氏所言隐含了多少无奈和悲痛。嘉庆年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②，此时，西方列强也正虎视眈眈地窥视着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而清王朝的统治者却丝毫没有觉察到外患的降临，仍然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道光即位后，各种矛盾空前激化，局面失控。就在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的声威一碰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③，中国从此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时，清王朝内部豪强兼并，官吏榨脓，政治腐败如此，法制已有名无实，加之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① 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6页。

^② 嘉庆元年（1796），以聂人杰、刘鸣盛、张正模为首的白莲教义军在湖北枝江、宜都一带起义，起义前后长达九年多，于嘉庆十年（1805）被镇压下去，影响却遍及湖北、四川、陕西、甘肃、河南五省。此间，又爆发了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

^③ 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真成了内外交侵的情势。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起义历时十余年，给中外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同治三年（1864），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清王朝的残酷镇压之下失败，至此，农民革命斗争渐趋低潮。此后，还出现了所谓的“同治中兴”。

19世纪7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外扩张，为了寻找市场和殖民地，他们公然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中法战争发生后，清王朝的“中兴”之梦濒临破灭；十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的惨痛教训则令国人震怒和觉醒，“深重的灾难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它促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认识的亟变”^①，也刺激了当时立志救国的文人志士敏感的心灵。随后，庚子事变发生，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光绪帝仓皇西逃，联军肆意烧抢，民不聊生。刘福姚在《庚子纪闻》中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了当时惨痛的情状：“居人盈衢塞巷，父呼其子，妻号其父，阖城痛哭，惨不忍闻。逃者半，死者半，并守城之兵，死者山积。”^② 庚子国难次年，《辛丑条约》签订，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中国半殖民地的程度愈益加深，救亡图存的呼声也日益强烈。由此看来，清末动荡的社会现实确实为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紧迫情势下，学术思想也要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适应，以考据治经为主的乾嘉学风自然要退出学术舞台，而由儒家今文经学引申出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再度受到提倡，成为当时思想的主流。它秉承和呼应了清初遗老们的思绪，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开拓出新的路向。嘉庆、道光年间，治经学者们由推崇东汉的古文经学（乾嘉之学）逐渐转向推崇西汉的今文经学，“尽管今文经学在古文经学的缜密考证面前显得捉襟见肘，但是，每逢‘致用’的迫切性困扰着一个时代的时候，每逢思想解放的呼声喷薄欲出的时候，今文经学的思想方法就会成为有力的武器，古文经学就会被当成‘虫鱼学’而抛弃”^③。今文经学

①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

② 刘福姚：《庚子纪闻》，《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25页。

③ 陈维昭：《带血的挽歌——清代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

的复兴正与嘉道时期的历史背景相合拍，它更强调阐发经典中所寓含的微言大义，通经致用，借题发挥，尤重《公羊春秋》和何休的注释发挥。但是，清代今文经学在其先驱常州学派代表人物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那里主要还是与考据学之间的学术之争，直至刘逢禄的弟子龚自珍、魏源，才突破了“为经学而治经”的樊篱，把公羊学探求微言大义的治经方法与提倡社会变革的改良思想结合起来，议论时政，主张经世致用。这与当时动荡的时局是密切相关的。

龚、魏开风气之先，继承了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这些启蒙思想家的余绪，进而引申发挥为经世致用的思想和务实的精神。他们批判政体，隐刺时弊，在当时的思想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世致用的思想在整个清末成为一股普遍风潮，渗透到各个领域。在词学领域，嘉道时期，常州词派登上词坛，取浙西词派而代之，成为词坛的主流。常州词派的宗主张惠言同时又是一位今文经学家，在治经过程中，张氏十分赞同东汉今文经学家虞翻《易》学理论“贯串比附”的解经之法，他说：“翻之言《易》，以阴阳消息六爻发挥旁通，升降上下，归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类，贯串比附，始若琐碎，及其沉深解剥，离根散叶，鬯茂条理，遂于大道。”^①张惠言移用此种方法论词，强调“意内言外”，讲求“比兴寄托”。道光年间，周济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衍阐发，发扬了张惠言的“比兴寄托”之说，进一步强调词体的社会功能，并提出“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和“词史”之说，使得常州词派的理论更为完善。其后又有同光时期的谭献、陈廷焯蹈厉发扬，影响深远。直至清末四大词人，他们论词承常州词派余绪而略有新变，在创作上，以缩笔包举时事，具有明确的“词史”意识。由此说来，常州词派论词深受今文经学传统的影响，所标举的“意内言外”、“比兴寄托”、“词亦有史”之说，亦体现着“经世致用”的精神。

经世致用的思想亦渗透到诗学领域。值此世变之时，无论哪个诗人、哪个诗派，都发出了同样的呼声：关乎天下世运，扫却风花雪月之思。最先摇旗呐喊的亦是龚自珍和魏源。他们以经术论政，意欲挽狂澜于既倒，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道：“今文学之健者，必推

^① 张惠言：《周易虞氏义序》，《茗柯文编》第二编卷上，清同治八年刻本。

龚、魏。龚、魏之时，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① 龚、魏对社会危机的深重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实为山雨欲来之时未雨绸缪的先觉者。他们面对“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的“衰世”^②，将其胸中郁怒不平之气与现实情势紧密绾结，搬运于笔墨之上，从而使得作品中饱含着深厚的历史内涵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散发出时代的气息。不仅如此，龚、魏论诗亦重史，强调“史”“诗”互补，认为“诗人之指，有譬献曲之义，本群史之支流”^③，“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④。可以看出，龚、魏的经世之志影响了他们的诗学观念，同时也影响了后来诗坛的诗学走向，其后的经世派作家虽然学诗宗法各异，论诗主张不同，但主经世致用则一，即万殊咸归一本。而此时的散文、小说也多是隐刺时政，揭露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内乱外侵，王室板荡，生灵涂炭，学术思想观念又有了新的转向，一些文人学者的经历与心态十分复杂，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经世致用的学术环境对诗人、词人及其创作风格乃至理论主张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对一些诗人、词人的文学作品进行考索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侧面进一步探究当时社会背景、学术思潮影响下的士人心态以及诗词创作、批评的盛况。而作为清末重要政治家、诗人、词人兼学者的文廷式，他的生活经历和诗词创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文廷式（1856—1904）一生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等重要历史事件，而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与他一生的行藏用舍相绾结，在其心灵和作品中留下了投影，同时也使其作品表现出一种深挚的志意和理念。通过解读和研究文廷式及其文学作品，一方面，我们可以进一步窥见动荡的晚清时局和当时文人的心态，了解和把握作家的个人情致和文学的独特生命；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其作品放置在当时时代和文学背景之下，全面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16页。

② 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7页。

③ 龚自珍：《乙丙之际塾议第十七》，《龚自珍全集》，第9页。

④ 龚自珍：《夜直》，《龚自珍全集》，第455页。

衡量他的艺术成就，为其在文学史的坐标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同时也为文学史的进入过程提供一个公允的评价。

文廷式抱负奇伟，才华横溢，学术以经史为要，创作以诗词为主。所作诗词雄浑郁勃，风姿仿佛少陵、稼轩，传达出强大的感发力量，彰显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清季诗坛、词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可以说，文廷式诗词的突出成就是清末政治、学术等与作者才情、身世、性格综合作用的结果。

就词作方面而言，文廷式论词自言“志之所在，不尚苟同”，所作长调横厉盘郁，苍劲兀傲，不随流俗，不拘泥于比兴寄托，可谓得稼轩之神髓，与以王半塘、郑叔问、朱古微、况蕙风为中坚的晚清四大家卓然相异。其令词秾丽婉约，设色绚丽，无率易之习，可直入花间之室。在表现手法上，文词多用比兴，寄意言外，隐刺时弊；创作上还承袭香草美人意象传统，化用《离骚》语句，表达了对屈原的认同感，故多凄怆感怀之作。审美趣味上，文词秀艳与刚健并举，发声清越，有律有文，这得益于他文笔之佳和音律造诣之深。《云起轩词》韵律和情感糅合无间，词人的主体情思在跌宕的旋律节奏中反复低回，深得曲致之妙，极尽顿挫之姿。

就诗歌体式来看，文廷式的七言凌驾五言，以句长而形成抑扬抗坠的铿锵音调；近体胜于古体，以篇幅短小而富有简重典雅之美。其七律情思沉郁，风骨遒上，上接少陵、义山，独具特色。七绝兴寄深远，多即景感事之作，可谓“独追杜司勋，波澜莫二”。五律典雅精工，感时伤事，每寓深慨。五古题材新颖，规模典重，婉而多讽，长篇中多具郁勃之气。七言歌行笔意灵动，长歌激烈，沉郁极处，则神气飞扬。就主题取向来看，文廷式的诗歌大多反映晚清动荡的时局，抒发政治忧郁。面对艰危的情势，诗人的忧患经历、探索追求、彷徨苦闷以及与友朋、亲人之间的伦理感情都可以在其诗歌中找到或隐或显，或曲或直的表达。此外，其描摹自然、啸傲湖山之作，清空华妙，将人生的意趣消融于山水清音之中，深得自然之趣。就总体风格来看，文廷式的诗歌倾向于沉郁一路，沉郁与忧愤深痛相连，与国运民生相关，它不同于剑拔弩张、毫无节制的偏激倾向，而是秉承了儒家“怨而不怒”的忠厚之旨和屈骚精神，情感表达内潜而不发露，收

敛而不怒张。

就创作的阶段来看，文廷式的诗词随着个人自身的遭际、情怀以及与师友门人的往还探讨有前、中、后三个时期的变化。文廷式少年聪颖，文采斐然，早期所作以典丽为胜；中期诗人身经世变，遭遇忧患，诗歌多是对忧危念乱的理性思考，学诗宗法杜少陵、韦端己、元遗山，词作具有明显的词史意识。后期诗人流连山水，寄情诗酒，政治热情日渐消减，时而仍抱中兴之望，诗作喜效皮陆。

二 研究现状、思路及方法

学者对于文廷式及其诗词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而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文氏诗词作品的蒐集评说以及年谱的编订。当时胡先骕、龙榆生、叶恭绰等都曾撰文论说，对文氏诗词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胡思敬、汪曾武为文廷式编订小传，大体梳理了文氏之生平行实；钱仲联则进一步蒐集整理文氏的生平材料，详加考证，撰写出《文芸阁先生年谱》，细致勾勒了文氏一生升沉起落的生命历程，这些基础性资料及成果对后来的文氏研究贡献良多。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成就主要有胡先骕《评文芸阁〈云起轩词钞〉王幼遐〈半塘定稿〉、〈剩稿〉》（《学衡》1924年第27期）、龙榆生《清季四大词人》（《暨大文学院集刊》第一集，1931年1月）、汪曾武《萍乡文道希学士事略》（《词学季刊》1934年10月第二卷第一号）、龙榆生《晚近词风之转变》（《同声月刊》1941年2月第一卷第三号）、钱仲联《文芸阁先生年谱》（《同声月刊》1942年12月第二卷十一号、1943年1月第二卷第十二号）、龙榆生《云起轩词评校补编》（《同声月刊》1942年3月第三卷第一号）、钱仲联《文芸阁先生年谱补正》（《同声月刊》1942年3月第三卷第一号）、王澐《云起轩词手稿跋》（《同声月刊》1943年1月第二卷第十二号）、钱仲联《文芸阁先生年谱续》（《同声月刊》1943年1月第二卷第十二号）、龙榆生《文芸阁先生词话》（《同声月刊》1943年1月第二卷第十二号），此外文廷式的弟子叶恭绰致力访求，辑得文氏诗作360余首，编为《文道希先生遗诗》（1929年铅印本），为后来文氏诗歌的校勘整理工作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文廷式的研究经历了数十年的沉寂又有